



大学译丛

[德] 京特·安德斯 著
Günther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过时的人 第一卷

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灵魂

范捷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学译丛

[德]京特·安德斯 著

Günther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过时的人 第一卷

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灵魂

范捷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时的人. 第一、二卷 / (德) 安德斯著; 范捷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4

(大学译丛)

ISBN 978-7-5327-4914-0

I. 过… II. ①安…②范… III. 现象学-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180011号

Günther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Vol. 1, 2nd ed.

Vol. 2, 3rd ed. 2002

© Verlag C.H. Beck oHG, München 2002

图字: 09-2005-462号

过时的人

(第一、二卷)

〔德〕京特·安德斯 著

范捷平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30×988 1/16 印张47.75 插页4 字数590,000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4914-0 / B·316

定价: 7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021-36162681

仅仅改变世界是不够的,我们一直在这么做,即便我们不那么做,世界也在改变着自己。问题是我们要去阐释这种变化,并去改变这种变化。目的是让世界不再没有我们而自己变化,避免它变化到不再需要我们。

中译本序^①

京特·安德斯与他的批判理论

安德斯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每个人，如果他想知道自己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里，并想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走出来参与这个世界——即便这种参与不能改变世界——那么他无论如何都应该读安德斯。

赫尔穆特·戈尔维策^②

人类拖着沉重的历史步履跨进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而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却戴着前所未有的桂冠豪迈地奔进了遥远的未来。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幻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人类则不得不时时地重新调整、定义“时间”、“空间”和“世界”的概念。因为这早已不仅仅是宇宙物理学的任务，它已经波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本体论的地位。

德国《明星周刊》披露，四万五千名参加过1954年核试验地区军事演习的苏联士兵，早年丧生的不计其数，而活下来的则几乎全部患有核辐射病；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至今仍严重影响着欧洲大陆的生态；人类一味扩大汽车产量，而面对臭氧层空洞的日益扩大却束手无策；热带雨林迅速消失，却填不满人类高消费的欲壑；全世界千百万失业大军在万能的电脑和以一当百的机器人面前张皇失措，无可奈何。人在他们的创造物面前相形见绌，自愧弗如。

时代发展的趋势是最终淘汰人类。无论这听上去是多么的荒诞，但这已经

逐步成为事实。因为人的工作已渐渐被人自己制造的产品所代替，企业主所面临的已不再是解雇工人的问题，而是自己被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解雇”或者被自己企业“解雇”的问题，从而使自己也成为多余的人。正如霍克海默(Hoc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自然则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回报人类。

现代人直面的问题应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哲学家京特·安德斯半个多世纪前的预言：“我们虽然能造氢弹，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制造的氢弹带来的后果……我们能将千百万人炸得血肉横飞，但我们不会为此而反悔，不会为此而流泪。”^③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作为机器和产品的创造者，在世界面临着自我毁灭危险的时代却无法看清我们真实的面目。

与其说安德斯在悲观地为世界末日的来临高唱挽歌，倒不如引用他1990年10月13日与K·保尔·李斯曼(Konrad Paul Liessmann)谈话中的一句话：

“如果有人责备我，说我不负责任地悲观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悲观远比不负责任地盲目乐观要好。”^④

一、童年和少年时期

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1902年6月12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国的布雷斯劳(今波兰境内)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京特·安德斯原名京特·施特恩(Guenther Stern)，1930年改名为安德斯，其德文意为“与众不同”，显然，

① 本书中译本按照慕尼黑C. H. Beck出版社2006年版译出，为便于非哲学专业的读者阅读，译者在安德斯原著注释的基础上又加注了127处，这些加注主要涉及人名、地名、哲学概念和历史背景等。

② 赫尔穆特·戈尔维策(Helmut Gollwitzer, 1908—1993)，德国现代著名左派基督教伦理学家、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反核武器运动和德国“六八”学生运动支持者，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的密友。著有《资本主义革命》(1974)、《解放与团结——新教神学导论》(1978)等。

③ 安德斯：《过时的人》，第一卷，慕尼黑，1988年，第17页。

④ 保尔·李斯曼：《论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Hamburg，1993年，第152页。

安德斯改名的用意在于表明他反叛性的思想。安德斯的父母威廉和克拉拉·施特恩都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威廉·施特恩还是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安德斯是次子，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安德斯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这期间，他在艺术上多方面的天赋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无疑为他日后成为能诗善画的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奠定了基础。

1915年，施特恩举家迁往汉堡，尽管施特恩一家是彻底德国化了的犹太人，然而，安德斯十五岁那年的经历却给他年轻的心灵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那年他与同学一起在法国参加收割，安德斯因为是惟一的犹太人而受到了同学们的殴打侮辱。从那时起苏醒的犹太意识伴随了安德斯整个一生。另外还有一件事加深了他的犹太意识，安德斯父亲的学生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①是一个放弃了犹太教而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并且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安德斯的博士生导师、著名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的助手，然而她并没有因此逃脱与千百万其他犹太人一样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煤气间的命运。安德斯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他思想深处的犹太意识与他一生所从事的社会政治活动和哲学思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他特别关注世界命运、人的命运，尤其是个人的命运的原因。

二、大学时期及纳粹上台前

1921年夏天，安德斯结束了大学哲学专业的学业，转到弗莱堡大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手下攻读博士学位。1923年在胡塞尔那儿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为《论“逻辑定律”的随机范畴之功能》。1925年，安德斯在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的哲学研讨班上结识了他第一任妻子、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汉

^① 埃迪特·施泰因(1891—1942)，德国女哲学家、妇女运动活动家、犹太出身的基督教天主教修女。曾在当代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成为胡塞尔助手，1918年成为海德格尔助手，也是安德斯所熟悉的老师之一。她共著有十八本专著(《论同情问题》1917年、《能与行——论存在哲学》1931年、《最终和永恒的存在》1937年等)，担任过十五年哲学教师，一生不停地研究和写作，堪称当代现象学早期大师之一。1922年皈依天主教，1942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遇难，1998年被罗马教廷授予圣女称号。

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阿伦特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备受海德格尔的赏识,阿伦特毕生将她的导师海德格尔视为偶像,在其日后发表的哲学著作和名噪一时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处处散发着海德格尔的思想。有人戏言,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学术思想的崇拜,也许是导致安德斯日后与她分手和安德斯对海德格尔的“反叛”的原因之一。不过,安德斯与阿伦特的主要分歧是在政治观点上。阿伦特是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她认为这是犹太民族的惟一出路,而安德斯则认为,通过马克思主义运动改变社会现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犹太人问题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安德斯认为只要解决了主要矛盾,犹太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这期间,安德斯一边替一家报纸撰写艺术评论并于1928年发表了一篇哲学论文《论占有》,同时开始积极准备自己的教授资格论文《音乐现状的哲学研究》。在这篇论文中,他试图建构一种既不是从客观音乐语言也不是从音乐的主观情感出发,而是从现象学出发研究音乐状况的音乐哲学。但这一论文最终未能发表,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纳粹的法西斯白色恐怖造成当时学术空气的极不自由;另一方面,正如他1983年9月11日在接受“阿多诺奖”时所说的那样:“与阿多诺的结识使我意识到,偏偏要与在音乐哲学领域像灯塔一样耸立的阿多诺一比高低,是不明智的。”^①

1930年,安德斯在布莱希特的介绍下,在柏林的一家报纸当专栏撰稿人,并开始启用著名的笔名安德斯。他早在1928年就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看出这个人“卑鄙的、煽动仇恨的、蛊惑人心的”纳粹法西斯思想,并指出,这个人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他所想的就全部述之言语,这个人卑鄙的耸言使得原来不卑鄙的东西也会变得卑鄙。安德斯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洞察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1930年至1932年间,安德斯的主要精力放在撰写一部揭露法西斯欺骗机制的寓言讽刺小说上,这部小说取名为《摩鲁西亚的地下墓穴》。安德斯在小说的前言中就直言不讳地称它是“谎言手册”,而同时又把

^① 保尔·李斯曼:《论京特·安德斯》,第174页。

它称为“真理手册”。这部小说几乎成了安德斯的私人寓言，在《过时的人》第一、二卷中，这部小说起到了贯穿整书的洛可可式的“花边”作用，我们常常可以读到安德斯引用的这部小说中辛辣的讽刺语录。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在成书六十年之后，直至1992年安德斯逝世前夕才得以出版。

三、流亡法国

1933年，安德斯通过布莱希特的介绍准备出版《摩鲁西亚的地下墓穴》。因盖世太保在搜到的布莱希特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安德斯的地址，便开始对《摩鲁西亚的地下墓穴》加以注意，但是纳粹党徒并没有发现这部小说的真正意义，这样安德斯才得以带着这部小说流亡到法国。但是这部小说在巴黎惟一的一家德文出版社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出版社的主编是个教条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认为这部小说没有遵循正确的路线，因而《摩鲁西亚的地下墓穴》的出版就被搁置了。在法国，他主要与阿·茨威格(A. Zweig)、德布林(A. Döblin)，以及他的大表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和犹太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交往。安德斯后来这样表述他与本雅明的关系：

“我出生后就认识他，我很难说我们在法国只是谈论哲学，因为我们首先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其次还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最终仍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此外，我们当然也谈论哲学^①。”在法国，安德斯还撰写了许多政治诗，同时完成并发表了他于二十年代末开始撰写的有关“否定人类学”的书稿《自由的病理学》，这部书已基本确定了安德斯日后哲学的发展方向。与德国二十世纪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截然相反，安德斯感兴趣的并不是人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是人在世界中失落，以及被定义为普通的存在物、不再具有具体生活方式的人和人被迫不断创新世界的命题。安德斯在《自由的病理学》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已不再仅仅是存在主义哲学或存在主义本体论层面上的问题，也不再仅仅在于定义自由的概念或者海德格尔的“被抛状况”(Geworfenheit)，而是人

^① E·舒伯特：《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汉堡，1992年，第28页。

由于自身的可塑性，不得不被由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再造的这一事实。

四、流亡美国

1936年，安德斯流亡到美国，起初他生活在纽约，靠当时在美国任教的父亲资助。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大多得以从希特勒德国转来资金，而安德斯则必须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这使他直接获得机器与流水线的经验，并使他的目光变得尖锐，开始对机器世界作出哲学反思。他从马克思的“不是工人使用劳动工具，而是劳动工具使用工人”的基本论断出发，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深化。他的思考跳出了阶级斗争学说的桎梏，避开由机器而引起的人和人对立的问题，而是在人类学的范畴内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去探讨人和机器的普遍对立的问题。

此外，他还在纽约社会研究院教授一些美学课程，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一些重要的哲学文稿，安德斯把它们取名为《情感历史的随笔——昨日的爱》。他一方面试图将通常不属于传统现象学研究范畴的情感和性的问题纳入他的哲学研究，因为一直以来，哲学这门学科是没有性别的，或者说完全是由男性主宰的；另一方面安德斯试图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透视美国社会中的性自由、人的孤独及嗜好心理分析等社会现象。

安德斯在这部文稿中认为，十九世纪时性爱还是个体在世俗社会的解脱方式，而在现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世界使得人的性爱 and 情爱关系作为价值取向已不复存在。物质世界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人在情感生活上的无聊、淡漠和麻木。没有骑士便没有骑士精神，没有宫廷便没有宫廷礼节，没有沙龙便没有绅士。在这种情况下，把目光转向过去，探寻已失去的就显得格外重要。

安德斯认为，从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看，性既是最普遍的，又是最隐私的，从人的情欲来看，性是最普遍的，而从社会行为上看，性则是最隐私的。普遍的性是对整个异性的抽象性欲，是指人类的非个体行为。探讨这种普遍性，并非把人类和动物等同，因为人能用艺术和语言来加工这一切；人也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康德意义上的“物”，具体地说，康德将婚姻定义成男女双方的性器官

使用，在康德看来，对方只是物，道德在婚姻双方互利享受的原则上得到解释。但是安德斯强调，性欲必须集中到某一个个体，因为有爱。爱对他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他反对美国当时的性自由，批判在美国这个发展高于一切的社会里，情感上两心相悦已成了多余之物，性爱只是保障健康的手段而已。这种激烈的观点自然不被当时自诩为进步和追求（性）自由的美国学生所接受和理解。

在美国，安德斯与布莱希特、马尔库塞（Marcuse）、托马斯·曼（Thomas Mann）、阿多诺过从甚密。然而，安德斯在学术上显得并不像他的朋友们那样成功。在美国，安德斯发表了两篇批评海德格尔的论文，他批评了海德格尔的“伪具体”思维（Pseudokonkretheit）^①。在安德斯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将自己作为一种畸形现象暴露在世人面前，其原因就是这种哲学将纯粹的自我膨胀转化为具体的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却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那就是海德格尔不愿意把目光转向真实世界。这使得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赏识。安德斯 1942 年间曾寄居马尔库塞在圣·莫尼卡的寓所中，他仍然处于孤独之中，他在日后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和马尔库塞也不谈哲学。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当时已经不是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了，也不属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圈子，我也从来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从未入过党。没有人把我当成过一回事，布莱希特认为我的谈吐不够马克思主义，学院派嫌我不把自己当成哲学家来同他们谈哲学。”^②

还有一件小事颇能看出安德斯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们的关系。有一次霍克海默派车去接安德斯研讨问题，他们工作到深夜，临走时霍克海默夫人给他一个口袋，安德斯回家一看，是一个沙丁鱼罐头、一个西红柿、一个苹果和几盒火柴。他马上打电话给霍克海默家，要他们马上派车来，司机来后，安德斯

^① 安德斯日后将这些批评集中收入《论海德格尔》一书，参见：Über Heidegger, C. H. Beck Verlag, München, 2001。

^② 安德斯：《安德斯的回答》（Günther Anders antwortet. Interviews und Erklärungen），Berlin, 1987 年，第 102 页。

将口袋原封不动地请他带回。

1939年，安德斯的电影演员女友在好莱坞受聘，两人便赴好莱坞。在带有传奇色彩的世界电影制作中心，安德斯在电影厂的道具房里当清洁工和道具保管员，他自己称自己是“给历史换尸衣的人”，这使他能去反思历史哲学和认识论。我们可以说，安德斯如果没有这段好莱坞的经历，也许就不会有他日后对新闻媒介和影视显现的深刻批判。1941年3月安德斯在日记中针对历史影片中的道具写道：“不仅仅原型被复制，而且被复制的东西成了原型，越多的原型在欧洲化为废墟，这里就越能通过复制原型来变成金钱和文化。”^①面对各个时代的不同服饰他发出感叹，人类需要服饰不只是为了御寒挡暑，而常常是为了标明每个人的社会身价。在这个时期，安德斯还写了一些电影剧本，不过它们从未被拍成片子。好莱坞电影道具房的经历，使安德斯认识到，他生活在一个失去了现实和过去本来意义的社会之中，这是一种在反思中获得的历史荒诞。

安德斯在那些著名的德国流亡哲学家、艺术家眼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不足为怪。正像安德斯所说的那样，当希特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将几百万犹太人焚为灰烬的时候，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院派哲学家们却在太平洋彼岸高谈形而上学，而安德斯却为德国纳粹的灭绝暴行和美国在广岛及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而震惊。这两个事件彻底改变了安德斯的生活和思想。五年之后，安德斯回忆他当时听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时的反应，他说，他的想象、他的思维、他的嘴、他的皮肤在那一刹那全凝固了：“我马上领悟到，1945年8月6日人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一天起人类具有了彻底灭绝自己的能力。”^②

五、回到欧洲

1950年，安德斯与他在美国流亡中结识并结婚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

① 保尔·李斯曼：《论京特·安德斯》，第20页。

② E·舒伯特：《京特·安德斯》，第72页。

弗罗因德利希(Elisabeth Freundlich)一起回到欧洲。由于安德斯既不愿意回到阿登纳政府亲美政治下的西德,也不愿意回到社会主义的东德,于是便在弗罗因德利希的故乡维也纳安家。奥地利是一个安德斯从未在那里生活过的国家,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安德斯靠给广播电台写东西来维持生活。战后维也纳社会成了安德斯现象学研究的对象,在第三帝国重镇的奥地利和维也纳,他看到人们对纳粹罪行“责任”的心理演变,看到人们如何将“责任”抽象化,如何鼓吹让受害的犹太人“宽容凶手”和以“和解”为由来使人忘记那场劫难。安德斯将社会回忆和社会遗忘这两种显现视为现象学中的重大课题,作为重返家园的流亡哲学家,他现在把与遗忘作斗争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他拒绝了朋友向他提供的在哈勒大学的教席,1956年他又拒绝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哲学教授职位,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他认为,原子弹的出现给人类的整体灭绝带来了现实的威胁,与这种威胁作斗争是他的当务之急。从1954年安德斯倡导反核运动起,他一直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1958年他访问了被原子弹摧毁的广岛和长崎,并将观感收入一个题为《桥上人》的集子里发表。同年,他飞往东京参加世界反核大会,并在东京举办了名为“核时代的道德”的讲座。1959年起安德斯开始同美国飞行员克劳德·伊特里(C. Eatherly)通信,伊特里是广岛“核行动”的气象侦察机飞行员,他的任务是给轰炸机发扔掷原子弹“小男孩”的信号。战后他为自己的行为和后果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因此与美国的政治、司法、军事系统发生冲突。罗伯特·容克(R. Jungk)1961年将他们的通信发表后,曾引起社会轰动。^①

对于安德斯来说,广岛事件以后,“人”这一观念已彻底改变,而人类在原子弹符号中的存在这一哲学命题就像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terra inkognita),对旨在解释世界的哲学来说也是同样,哲学的功能在广岛事件之后必须改变。他呼吁哲学走出象牙宝塔,因为原子弹并不只是悬挂在大学的教

^① 这些通信及安德斯早期的反核文章收录于《到处是广岛》,参见: *Hiroshima ist überall*, C. H. Beck Verlag, München, 1982年。

学大楼上空。哲学的首要任务已转变为给在迷惘中徘徊的人类指点迷津，由于人在核爆炸中变得聩聋失聪，因此安德斯的哲学语言是激进的、夸张的。安德斯认为，世界的末日由于核大战的危险就在眼前而变得极其实际，核力量摧毁的不仅是现在、将来，同时还是过去，核武器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已无法驾驭自己的产品，它代表了一种绝对的虚无主义，一种对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和文化彻底否定的力量。与基督教世界末日的本原不同，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末日并不意味着解脱和新世界的诞生，而是如同《启蒙的辩证法》中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人类“在胜利的喜悦中毁灭”。原子弹就是世界、人类和时间的终结。在安德斯看来，核武器虽然是一种人类灭绝危险的物化形式，但它不仅仅只是物，它是一种固定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威胁和讹诈的行为方式。拥有核武器的人并不仅仅拥有使用它的可能性，而是从拥有它的那一刻起，便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时时刻刻地使用着它。

越战时期，安德斯是坚定的反战派，除了积极参加反战运动之外，他还以辛辣的讽刺口吻发表了分析美国战争语言的小册子《游览美丽的越南——今日侵略 ABC》。1966年，安德斯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写下了大量的哲学笔记，并于1967年以《墙上的字迹》为题结集出版。安德斯在反思纳粹迫害和杀害犹太人的根源时，并不完全恪守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不同意将政治迫害和种族迫害区别看待，尽管几百万被杀害的犹太人也许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是政治却对他们感兴趣。希特勒正是成功地让无产者、失业者、小资产阶级感到他们在犹太人面前的优越性，安德斯认为，挥舞“雅利安人”的标签不是希特勒的目的，而是他消灭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手段。这样，犹太人不仅在纳粹分子眼里，而且也在德国大多数民众心目中成了邪恶的象征和撒旦的化身，在邪恶对立面的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天使，安德斯将这种善与恶的本体化视为独裁直接的前提。

对安德斯来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比广岛更使人触目惊心，然而他认为人们没有将两种屠杀的道德责任划清。广岛的屠杀是没有作案现场的凶杀，凶手的手上没有沾上一滴血，或许人们还会将凶手看成正义的天使，安德斯将广岛的

悲剧定义为“没有凶手的屠杀”，美国飞行员伊特里代表的是没有责任的罪恶。奥斯威辛集中营惨案的元凶艾希曼尽管手上也同样没有沾上一滴血，但是他是“办公桌凶手”，纳粹的罪恶在于他们的凶残已成为日常行为、日常计划，他们已无法从他们的罪恶中认识到他们的罪恶行径。

六、晚年

1967年，安德斯获联邦德国批评家协会文学奖，1978年获巴伐利亚州艺术学院文学奖，1979年获奥地利国家文化出版奖，1980年获维也纳文化出版奖，1983年获法兰克福阿多诺奖，1985年由于政治原因拒领安·格吕菲乌斯文学奖^①，1992年拒绝接受维也纳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安德斯自从回到欧洲后一直受多发性关节炎病痛的折磨，但他并没有停止过写作、停止过哲学思考。到晚年，安德斯由于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行动自由，年迈又给他带来诸多不便，而他却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他看到了漫长的生活经历给他带来的智慧。他逝世前一年说，高龄是福分，在失去勇气的时候更需要勇气。这种勇气体现在他一直关注着世界的发展，关注着东欧局势的发展，关注着德国的统一和海湾战争。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的新格局面前，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有人问到在二十世纪即将走完它的历程时他是否还坚持他五十年代提出的哲学命题，是否还坚持核威胁，是否还坚持世界末日的观点，安德斯回答道：“1945年人类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核毁灭，当时还没有艾滋病，环境污染远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我相信，我对核毁灭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带给人类的一切灾难，我们今天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让自己遭受灭顶之灾。”^②

1992年12月17日，京特·安德斯在他九十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故世。整整十六年过去了，我一直收藏着《法兰克福通

^① Andreas-Gryphius-Preis，该奖项由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为纪念德国巴洛克诗人安·格吕菲乌斯而设立，1957年首次颁奖。——译者

^② 保尔·李斯曼：《论京特·安德斯》，第198页。

讯》在安德斯逝世两天后发表的纪念文章，泛黄的报纸上写着令人深省的话：“安德斯教会我们辩证地去思考，我们面前不一定是未来，也可能是未来的毁灭；不一定是天堂，也可能是世界大火；他教会我们时时刻刻去关注世界的时钟，去审视文明所带来的灾难。安德斯告诉我们，进步的意义就在于阻止进步。”

七、“没有世界的人”——对传统人类学的否定

安德斯在其主要哲学著作《过时的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进步使人盲目。在《过时的人》中，安德斯将对“进步的迷信”描述为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孩子”，这使人类看不见世界的末日，不相信世界会有末日，更不相信会有糟糕的末日。因为人类笃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一比较级概念既不包含坏，也不包含终结的意义。这种盲目的乐观和自信，在安德斯看来，恰恰是人类和人类世界的危机所在。

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青年安德斯对传统人类学持否定态度的一些观点，安德斯对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命题持怀疑态度，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即“在之中”，他说：“‘在之中’是此在存在形式上的生存论术语，而这个此在具有在这个世界之中的本质性机制。”^①在这个前提下海德格尔提出人“寓于世界而存在”的理论。安德斯的出发点则是，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动物不同，动物是适应生存环境，而人既寓于世界之内，但由于人的创造性又使自身处于世界的对立面，因而人在这个世界中是“陌生”的。而人的“陌生性”又恰恰是人的自由的前提。一个具体的存在（人）是整个存在（世界）中的某一个个体，这种个体存在使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样，安德斯首先通过二元论将人从世界中离异出来，对他来说，从结构上来看，人总是“后验”（a posteriori）地获得世界的，也就是通过经验。安德斯认为，后验正是人本身的先验存在，后验性是指人的后验特征，也就是说，人只在具体的社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1987年，第78页。

会生活中才能获得与世界的关联性。

对于安德斯来说，世界不仅仅作为对象和作为人的对立面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空间位置理论上的意义，“世界的存在表明了人的位置，它同时表明了人在世界内和与世界的对立性，它表明了人在世界中不依赖世界的自由”^①。经验不仅仅是人认识世界的固定形式，而且它也来自改造世界的积极形式——实践，这在安德斯看来是人与世界离异的一大特点。人不仅仅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造现有世界，而且还不断地去改变他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人不仅仅与“现有”世界没有本质的依赖性，而且还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世界。在“没有世界的人”的命题下，安德斯不仅看到科学和艺术与世界的对立，他同时还看到，人是惟一能“告别”和“放弃”世界的存在物，这是一种以“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在”。这种人与客观世界的离异性首先取决于一点，那就是只有人才具备从世界离异出来的巨大力量，它使人具备自我欺骗的能力，这种自我欺骗体现在人在事实面前盲目的傲慢。安德斯看到，人就是从这个看来是自由的、不受世界约束的自我存在出发而否定世界的存在。

1942年夏天，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洛杉矶共同举办的《需求理论》的讲座上，安德斯提出他在《自由的病理学》中的观点并总结道：“创造是人的天性，其本质是不稳定性，也就是说，人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世界可以提供的，因此人不得不自己来创造一个能满足人的需求的世界。”^②人的创造性使得作为存在物的人从其他的存在中离异出来，并将自己变成一种与世界脱离的抽象物。

八、普罗米修斯的羞愧

在“创造是人的天性”这一思想指导下，安德斯发展出他的机器批判理

① 保尔·李斯曼：《论京特·安德斯》，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